



第六卷

社会治理与城乡一体化

Social Gover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主 编/张 翼
副主编/梅 哲 张文博 黄丽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六卷

社会治理与城乡一体化

Social Gover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主 编/张 翼

副主编/梅 哲 张文博 黄丽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治理与城乡一体化/张翼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

ISBN 978 - 7 - 5097 - 7057 - 3

I. ①社… II. ①张… III. ①社会管理 - 中国 - 文集
②城乡一体化 - 中国 - 文集 IV. ①D63 - 53 ②F29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4287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
社会治理与城乡一体化书

主 编 / 张 翼

副 主 编 / 梅 哲 张义博 黄丽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谢蕊芬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胡 亮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36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057 - 3

定 价 / 9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编委会

主 任：李培林

副主任：陈光金 孙壮志

委 员：刁鹏飞 景天魁 李春玲 罗红光

王春光 王晓毅 吴小英 夏传玲

杨宜音 张旅平 张 翼 赵克斌

秘 书：黄丽娜

总 序

我国博士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设立的。1984年5月21日，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成。1985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施博士后制度。

我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就是1988年在北京大学设立的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则成立于1999年。1999年至2013年，14年过去了，至今已经招收了近百名博士后，他们多数都已经出站，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实践证明，中国博士后制度对于选拔、培养优秀人才，促进人才流动，创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此后，举办这个论坛成为一项制度，坚持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先后在北京、武汉、厦门、沈阳、重庆等地成功举办了七届，2013年在贵阳举办“第八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与我国其他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论坛相比，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有这样几个特色。

第一，参加人员的广泛性。参加论坛的，既不限于在站的博士后，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参加论坛的热情也很高；也不限于本站的博士后，其他高校的社会学博士后也有不少人参加；还限于社会学的博士后，其他学科的博士后往往也来参加；而且不限于博士后，博士后的合作导师也满怀兴趣地参加。这样就使这个论坛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二，论坛会上会下交流方式多样。这个论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为依托，联谊会还设立了地区分会，他们积极参与论坛的组织工作，除了邀请著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组织专题分论坛，还组织会下的讨

论会和会后的社会调查。很多博士后反映，通过这个论坛活动，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够不站站内站外，不分学科专业背景，充分深入地交流，并能发现很多平时自己本学科容易忽略的问题，扩大了自己的学科知识面，同一个社会问题可以得到不同学科视角的诠释和理解。

第三，学术成果丰硕。论坛参加者以文入选，要提交合乎学术规范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而且论文的题目要贴近论坛的主题。而论坛的主题，往往是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样，每年论坛之后，都有一批高质量的涉及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博士后学术论文，我们选择其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就形成现在这个社会学博士后论文集的系列。我们希望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个论文集系列，能够记载我国的巨大社会变迁，也记载社会学博士后的学术足迹。

改革开放 35 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新的核心议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探索中，社会学承担着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和研究重任。但愿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的这个论文集系列，也能为担当这一学术使命贡献一份力量。

是为序。



2013 年 6 月 25 日

目 录

社会治理创新

从中西方历史渊源论知识分子与政府之关系	高予远 / 3
社会治理系统之协调机制创新研究	王 斌 黄 蕾 / 16
和谐社区构建下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李 敏 / 28
我国县域社会包容式治理研究	
——以重庆市巫溪县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郑向东 侯祖戎 / 38
政府间惯性协作机制理论与“长三角”实践问题	赵定东 / 57
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模式探索	
——以北京市大兴区村庄社区化模式为例	赵春燕 / 69
企业制度性文化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作用研究	
——以 X 市国家技术开发区企业为调查个案	唐名辉 / 80
企业创新模式实证研究	
——沈阳机床 SNRC 系统集成创新模式	孟翔飞 / 92
虚拟社会的秩序与治理	
——从微博谣言说起	胡献忠 / 123

社会保障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动态变化探析	
——以 Q 市 S 区为例	崔 凤 杜 瑶 / 135
农村低保制度：运行逻辑与减贫效应	
——基于统筹城乡发展视角对惠农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分析	李海金 / 149

中国三支柱养老保险改革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张祖平 / 164
农村留守儿童意外伤害保险问题研究	游 春 / 174
“住有所居”何以可能	
——吉林省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体系构建	黄艺红 周玉梅 / 186

社会福利服务

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责任结构	高和荣 / 199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付模式研究	
——以重庆市 A 区实证研究为例	李 孜 / 211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状况及新发现	
——基于河南省鲁山县的调查	张奎力 / 230
促进中国人才创业的对策研究	汤伶俐 肖鼎光 / 253

城乡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统筹城乡背景下农村实用队伍建设研究	
——以重庆市潼南县为例	马文斌 / 269
基础教育的城乡倾斜与整合	吕庆春 / 283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重庆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梅 哲 陈 霄 / 303
黑龙江省巴彦县土地规模经营调查	李道刚 / 322
农民利益表达的国际借鉴	袁金辉 / 329

劳动力与城乡社会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关系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	蔡笑腾 / 339
先赋性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获得的影响分析	汤兆云 / 349
多元生计模式下的移民生产安置	王毅杰 / 363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 375

社会治理创新

从中西方历史渊源论知识分子与政府之关系

高予远

摘 要：中西方各自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这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模式。由于西方的精神特质及基督教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性质，从传统上西方就形成了两类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一是从绝对理念出发，以理性的法则推演出理想的社会体制，对政府进行批判；二是以此理想的社会体制为依据，结合现实建立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行方式。这两类知识分子构成了西方社会政治进步的推动力量。在中国社会，释老与政治关联度较少，儒家在起源上与王权有密不可分的合作性及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儒家知识群体与王权之关系是合作前提下的批判关系。现代中国产生了类似西方那样第一类的知识群体，这一类知识群体对自身的发展应有一个高度的警惕，警惕自身对政府之批判、对社会之批判超越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从而导致中华民族再付出不应有的代价。

关键词：基督教 儒家 王权 精神特质

中西方各自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中西方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模式，与中西方民族的精神特质及传统上中西方民族主流文化与政府之关系密切相关。本文中，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西方传统主流文化主要指基督教文化。之所以如此界

定,是因为儒家文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王权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普通百姓道德行为的规范与依据,而基督教文化融合了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从公元初至今对西方社会的组织方式、民众道德仍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 西方知识分子与政府之关系

(一) 西方文化精神的特质

西方文化精神,可以说是信仰与思辨理性的精神,是信仰与思辨理性二者交融通向终极实体的精神。信仰与思辨理性二者交融,共同形成终极实体的精神力量,这是西方文明的伟大传统。信仰上帝与思辨理性就使西方知识分子,不断从上帝这一爱与正义化身的角度思考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且予以批判。在终极实体这一概念的影响下,思辨理性有一种要对整个世界进行理性构建的要求。

由于西方文化精神的这一特质,西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对绝对终极的追求,无论这一终极追求是上帝也好,是绝对正义也好,是绝对公平也好,其必从绝对的观念出发,用思辨理性去规定这一世界。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之论,经典地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特质:“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①

西方文化精神与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如下特质,是与西方传统文化以基督教为主流密切相关的。基督教是希腊文明解体之后,犹太教与希腊文明融合产生的宗教。希腊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辨理性。这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柏拉图的《巴门尼德》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皆是古希腊思辨理性的最高体现。尤其是《巴门尼德》对“存在”问题的思辨把握,可以说是古希腊人用思辨理性去把握终极实体的伟大努力,《巴门尼德》经典地体现了古希腊人用思辨理性把握终极实体的思辨智慧。

^①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页。

与希腊文明不同，犹太民族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他们信仰的核心是“无形的、独一的神耶和华”和“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犹太人的这一信仰使这一民族成为一个有着严格戒律的民族，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必须以神的戒律严格约束自己。因此，我们可以说犹太教的特点在于坚定的信仰与严格的戒律，正是通过这种坚定的信仰与严格的戒律，才使犹太民族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即虽散居于万邦之中，但又强烈地保持着本民族的固有精神特性——信仰与戒律，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心灵深处中，他们是神的选民。

这两个文明皆与终极实体发生关联。只不过希腊人通过思辨理性认识终极实体，而犹太人是通过信仰去把握终极实体的。在希腊化时期，这两个民族进行了伟大的文化融合，即信仰与思辨理性交融在一起，这就使与终极实体发生关联的信仰与思辨理性有了一种崭新的特点。信仰与理性的融合，导致信仰使理性充满了激情；同时，理性又使信仰立足于严密的思辨理性基础之上。信仰与理性在基督教中进行的这一伟大融合，一方面赋予西方信仰与思辨理性以崭新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西方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的伟大智慧。

由于基督教融合了犹太教与希腊精神，因而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西方文化的这一历史传统，铸就了上述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二）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

基督教文化源于无产者，源于被压迫者，源于对终极实体的追求，源于从绝对的理念——上帝那里，以理性法则推演出整个社会应有的规范体系。这就从文化本源上决定了基督教与王权的关系，即基督教与王权的关系乃是一种分庭抗礼的关系。

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体现了上帝的精神力量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或者说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基督教丧失其政治权力之前，西方社会的权力模式都是二元制的，即源于基督教的权力与源于世俗王权的权力。这两种权力彼此斗争着，构成了西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督教形成自己大一统的教会权力之前，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基督徒以个人的圣洁的品行，以上帝的名义对王权的非人道、非道德进行干预。如在公元475~476年：

这位圣人（苦修僧圣丹尼尔）在隐居处已经生活了24年，而且至死将一直这样生活。但是，有关民众苦难的报告竟使他重返人世，这本身就是对皇帝处理公共事务不当的一个毁灭性的指控。圣丹尼尔率领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居民前往郊区皇帝藏身的宫殿，一路上用精神方式对民众进行心理和肉体治疗。当卫兵阻止人群进入时，这位圣人指示民众跟着他做《圣经》上的象征性动作，掸去身上沾染的宫殿区的灰尘。他们的动作声音如雷鸣般轰响，大多数卫兵受到感动，背弃了自己的主人而加入这位苦修僧的队伍。皇帝派人追着离去的圣人请求他再返回来。但是这一切都徒然了。最后，皇帝不得不到大教堂拜见圣人，匍匐在他脚下。为了让圣丹尼尔重新回到岩顶上的住所，从而保住自己的皇位，他最终被迫付出代价，向东正教做公开忏悔。^①

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徒个人的道德力量影响民众，从而对王权非正义、非道德的行为进行批判。这一时期，基督教虽然没有大一统的教廷这一组织形式，但基督教教徒以个人的品行与威望对世俗王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王权不得不慑服于基督教教徒的精神力量。

到了公元11世纪，基督教开始走向自己的鼎盛时期，基督教将自己的信仰制度化，形成了自己的大一统教会。基督教利用这一大一统的教会对世俗王权进行道德、精神上的干预。11世纪，托斯卡人希尔德布兰和他的继承者在东罗马帝国遗弃了的一个边远市镇里，成功地创立起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体制。这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组织体系，使罗马教皇在人类心灵中拥有的帝国，要比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帝国伟大得多，仅就实地而言，它就囊括了西欧的大片土地。^②

基督教通过这种方式，使其处于一个高度的、自成体系的制度化组织之中。这种制度相对尘世王权而言有相当强的独立性，甚至其鼎盛时期还可以对“承认教皇权力的地方社会的政治独立提供保障”^③。在基督教教徒看来，精神的力量高于世俗的力量。

① [英] 阿若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96页。

② [英] 阿若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79页。

③ [英] 阿若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79页。

其后，由于基督教教会自身的腐败，基督教的影响渐趋于式微。但经过宗教改革，尤其20世纪后，基督教彻底与政治权力无关。失去权力的基督教，并没有失去其固有的对社会非道德的批判力量，没有失去以精神力量干预世俗政权的历史传统。或许正因为基督教失去了政治权力、失去了中世纪那种以具体权力干预世俗权利的力量，基督教也遏制了因权力而产生的腐败，此时的基督教才真正以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之一。

从上述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基督教一直是独立于世俗王权的。正如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言：“它（基督教）是对这个政权的一种社会反动、一种心灵的抗议。”^① 基督教的整个历史都立足于精神力量高于世俗力量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立足于心灵对世俗世界非人道、非正义的抗议与批判之上。

（三）西方知识分子与政府之关系

基督教与王权的分庭抗礼，使西方知识分子从绝对理念以思辨理性推演出社会应遵守的法则，这是西方知识分子对待现实社会的一个历史传统。

基督教与王权的这一历史关系以及西方精神特质，这一切决定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与政府之关系。西方知识分子从公平、正义等这一类绝对的理念出发，建立一个规范世界的体系。政府必须在这一体系中，服从正义、公平等理念推导出的规范，或者即使不能完全实现理想的政治，也应不断改革政府的体制与修正政府的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从绝对理念出发所建立的理想政治的要求。

关于理想的政治与现实政府的关系，英国著名学者厄奈斯特·巴克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一段论述甚能体现理想的政治与现实政府之间关系的意义。

《理想国》的理想并非与现实相分离的意义上的理想：它是这种意义上的理想，即呈现出现实的国家应然的样子，如果它们遵从人类制度的根本法则的话——这些法则是现实的国家（甚至在它们目前状况下）的基础，但又或多或少地与它们不相符。正因为是与现实相联系的，柏拉图的理想就有其现实和实践上的价值。它不仅辅助着实践的才智，提

① [英] 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96页。

供目标和目的以便让现实去符合；它也辅助着纯粹的理性以便可以据此批判现实生活。

探究绝对正义的性质是为了获得一种理想，以便人们可以根据它所展现的标准以及现实状况与它相类似的程度来评判那种状况。^①

从上述这段论述中，如“它不仅辅助着实践的才智，提供目标和目的以便让现实去符合；它也辅助着纯粹的理性以便可以据此批判现实生活”，我们可以将西方知识分子与政府之关系分为两类：一是从绝对理念出发，通过理性演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法则，并对现实生活、政府行为进行批判；二是从理性的法则，根据现实，构建政治理论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当然也有一类知识分子是完全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维护现政府的种种所为，不用人类理想的法则“辅助着实践的才智”“辅助着纯粹的理性以便可以据此批判现实生活”。这一类知识分子虽在现实上阻碍了西方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但由于西方的历史传统与西方的精神特质，这一类知识分子阻挡不了前两类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政治文明前进的推动力量。

柏拉图、马克思可以说是第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即从绝对理念出发，通过理性演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法则，并对现实生活、政府行为进行批判。洛克、休谟、孟德斯鸠、杰斐逊等可以说是第二类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一类知识分子以理性法则为依据，结合现实，构建切实可行的政体学说，并不断将理性与现实相结合，推进政治体制的完善。

二 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之关系

（一）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

中国人的信仰、理性与西方人的信仰、理性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的信仰没有一个如西方那样的外在的终极实体，中国人的信仰有着极其强烈的内在特性，信仰其内在的至善心体。内在至善心体非外于吾人之心，而是吾人之心

^① [英] 厄奈斯特·巴克著《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338页。

内在入精微、至广大后的心体。由此至善心体推演出仁义礼智信与礼乐教化。仁义礼智信与礼乐教化，既是社会规范，为士人及大众所遵循，是大众与士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依据，同时其也是源于吾人对内在至善心体的信仰。

关于中国人信仰的这种内在特性，钱穆之论甚能体现中国人的这种信仰特征。

惟西方宗教信在外，信者与所信，分别为二。中国则为人与人相交之信，而所重又在内。重自信，信其己，信其心。信与所信合二为一。孔子曰：“天生德于予。”《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孟子言：“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国人观念中之天，即在其一己性命内。……离于己，离于心，则亦无天可言。^①

天在吾人之外，但在中国哲学中，天“即在一己性命内”，中国儒学通过“尽心知性，尽性知天”这一修养功夫，彻底将外在的天转变为对内在至善心体的信仰。且不惟儒家思想如此，即便是释老哲学的信仰也是在其内心，而非如基督教那样有一个外在的终极实体。

在理性上，西方的理性是一种对终极实体的思辨理性，故其信仰与理性二者密不可分，在对终极实体的把握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人的理性非如此，其是一种立足于内在信仰基础上的实践理性，而沿有西方特质的形而上学体系，这可从中国的五经文献中明确地得以确定。当然，在《易经》中，也有围绕“易”“道”等核心概念进行的理性思辨。如“夫《易》者何为者也？夫《易》者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②。这种理性与其说是思辨理性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阐释，中国哲学的这种理性与希腊哲学的理性有着本质的不同，最终这种理性不可能成为如古希腊哲学那样的思辨理性，而是转变为一种实践的理性，即在具体的事情中进行慎思明辨，在具体的事情中体现“易”与“道”、体现内在至善心体，而非对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的慎思明辨。

所谓实践理性，即从至善心体出发处理事务，这种实践理性的出发点是至善心体，或曰仁。实践理性的完成是义，义者，宜也，即君子处理事务要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第1页。

② 《易·系辞上》。